

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外交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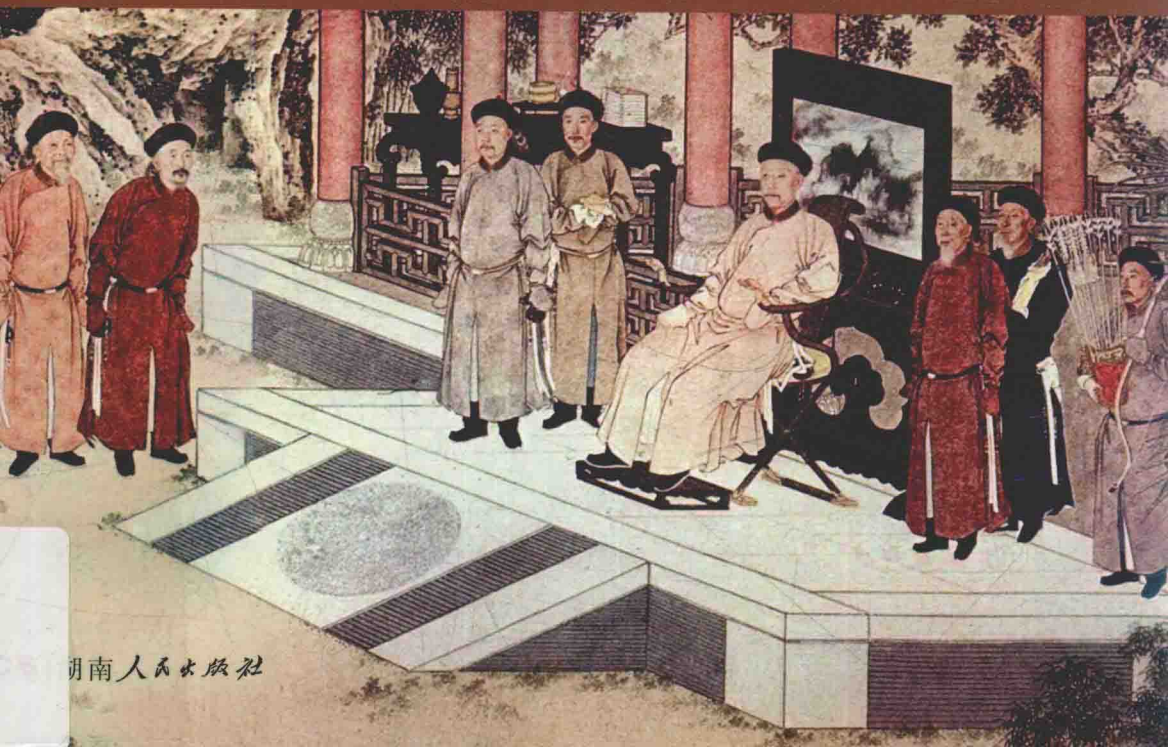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Diplomacy



夏商时期—近代以前

中国古代 外交史

袁南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A HISTORY OF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中国历史——古代史

中国古代 外交史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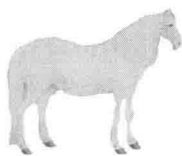


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外交传统

中国古代 外交史

夏商时期—近代以前

袁南生 著



A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Diplomacy

CBS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外交史 / 袁南生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561-1682-9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外交史—中国—古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8828号

ZHONGGUO GUDAI WAIJIAOSHI

中国古代外交史

著 者 袁南生
责任编辑 李思远
装帧设计 吴颖辉
封面图片 FOTOE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682-9
定 价 9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序 言

自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秩序以来，回顾、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及相关领域历史的著作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优秀作品。然而专注于中国古代“外交”实践，并进行系统性梳理的著作却很少读到。袁南生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外交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令人倍感欣喜。作者命我作序，我虽缺乏史学素养，更无外交实践经历，仍慨然应允，勉力为之。如果能有几句话可为读者借鉴，就算不辱使命了。

外交史属于外交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对研究者的综合水平要求较高。袁南生教授在本书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历史学修养和多年外交实践经验练就的专业眼光。本书内容涵盖了中国自夏商直至近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外交事件、外交制度、外交思想、外交谋略、外交人物等方方面面，分析了不同的外交决策对国运民生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总结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外交的特点。全书结构完整而严谨，层次丰富而清晰；书中所用材料之详实，文理之细密，均令人赞叹。这是一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将其作为查阅中国古代外交实践的工具书来用。

读这本书，有两个概念不可不细察：一是“中国”，一是“外交”。这两个词今天可说是最平常易懂的，但在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把握这两个词的确切内涵及其历史沿革，却是理解许多关键问题的钥匙。中国历史绵延四五千年，疆域、民族、文化屡经变迁。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从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祖先手中，我们传承了什么，又丢弃了什么？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国名，而“中国”“中华民族”等概念是何时诞生的？它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相对应的，历史上的中国，哪些部分是“外”？哪些部分是“内”？“外”与“内”是如何相互包容、相互转换的？这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思考、研究的根本问题，可以参考本书

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著述加以理解。

一个需要了解的事实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之间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传承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不同，古代“国际关系”也并不建立在国界分明、主权平等、互不侵犯的基础之上。因此，古代与现代“外交”概念的含义和原则，既有许多相近之处，又有一些根本不同。明白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人的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才能凝聚起既含同情而又带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夷务外交时代”。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说，“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种种复杂现象，应当给予历史主义的评价”。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以史为鉴”是历代政权和知识精英重视的传统。本书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外交的特点及其经验、启示和教训。作者总结的“不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的规律”“远交近防的规律”“避免特殊国家关系现象的规律”“政策越开放外交空间越大的规律”“国家利益高于任何其他利益的规律”“国家越强大越能韬光养晦的规律”，等等，均有详实完备的历史事实为支撑，经得起推敲。这些规律植根于中国古代历史，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外交现实。对照省察，足资借鉴。

“夷务外交时代”虽然远别于“国务外交时代”，但无论什么时代，国家事务总是内外有别，“外务”同“内务”却又部分重叠，相互影响。“夷人”既可变“华人”，“华人”亦可变“夷人”。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所遭遇的种种矛盾、争端、悲剧、喜剧，所产生的合作与交融，无不根源于人性，根源于人的社会归属，即当代学术语言之所谓“认同”。人们的认同易变，但社会交往中的文化习惯难变。因此，古人的智慧和成败得失值得今人珍视。本书所描述的古人智慧和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外交传统，也有益于我们思考如何使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于本国人民，推动全人类的进步。

我与袁南生教授相识已久，对他的学识才情、为人处世都很尊敬。他是性情中人，是重亲情、重友谊、乡土观念浓厚的湖南人，同时又有极为开阔的全球视野，思维活跃，知识渊博，幽默风趣。袁南生教授的外交生涯横跨亚非拉三大洲和美国，在大使和总领事任上工作十分出色，多有开拓，富于献身精神。同时，他对中国历史、古典文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古体诗词也写得韵味十足。尽管公务繁忙，他始终笔耕不辍，出版过多部专著和诗集，堪称著作等身。这不仅在国家公务员中如凤毛麟角，也令我等自称学者的人自叹弗如。

袁南生教授近十年来尤其关注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外交传统,其所撰写的“千年外交”系列文章引发热烈反响,为《中国古代外交史》的最终成稿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本书涉及的历史事实浩如烟海,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重点突出,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外交特点和规律的点评总结类文字,眼光独到,精彩纷呈。读者也不难发现,在书中呈现的那一个个生动活泼、可敬可叹的外交人物身上,在重大历史关头发生的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中,寄托着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现实关怀。与一些冷静的学术类著作不同,这是一本带着温度和情感的书,让我们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一颗热情跳动的心。读者将从本书中收获的,不仅有知识,还有性情的陶冶。

王缉思

2017年立春于北京昌平陋舍

目 录

前言: 中国千年外交演变的基本轨迹	001
第一章 中国外交的起源时期	011
第一节 夏朝的外交	011
第二节 商朝的外交	013
第三节 西周的外交	016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上)	023
第一节 列国纷争的时代	023
第二节 国际法的萌芽	025
第三节 盟会外交	028
第四节 尊王攘夷的外交	030
第五节 合纵连横的外交	034
第六节 质子外交	039
第七节 联姻外交	045
第八节 救灾外交	049
第九节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人员的价值取向	053
第十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制度	058
第十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的特点	063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下)	070
第一节 孔子、孟子的外交思想	070
第二节 老子的外交思想	073
第三节 墨子的外交思想	076
第四节 管子的外交思想	079

第五节	孙子的外交思想	083
第六节	晏子的外交思想	085
第七节	韩非子的外交思想	089
第八节	鬼谷子的外交思想	092
第四章	两汉时期的外交(上)	096
第一节	统一的“中国”国家的形成	096
第二节	汉朝与匈奴的关系	098
第三节	张骞通西域	102
第四节	朝贡制度的确立	106
第五节	冯嫪三使乌孙	108
第六节	班超出使西域	110
第七节	汉代的外交制度	114
第八节	汉代外交的特点	118
第五章	两汉时期的外交(下)	122
第一节	羁縻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基本定型	122
第二节	羁縻之一:朝覲	124
第三节	羁縻之二:册封	126
第四节	羁縻之三:通使	128
第五节	羁縻之四:和亲	132
第六节	羁縻之五:互市	135
第七节	羁縻之六:纳质	137
第六章	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外交	141
第一节	三国的形成	141
第二节	三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143
第三节	三国与域外国家的关系	146
第四节	鲁肃的外交谋略	149
第五节	诸葛亮的外交谋略	154
第六节	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	159
第七节	三国时期的外交制度	162
第八节	三国外交的特点	170

第七章 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外交	172
第一节 晋朝的兴亡	172
第二节 晋朝对外关系	174
第三节 法显的印度巡旅	176
第四节 两晋时期的外交制度和外交特点	178
第五节 十六国的外交制度与外交特点	181
第八章 南北朝时期的外交	186
第一节 南北朝的出现	186
第二节 南北朝的对外关系	188
第三节 南北朝的诗赋外交	193
第四节 南北朝的围棋外交	196
第五章 南北朝的妙简行人	197
第六节 南北朝的外交制度	201
第七节 南北朝外交的特点	203
第九章 隋朝的外交	207
第一节 隋朝的统一	207
第二节 隋朝的对外关系	209
第三节 长孙晟出使突厥	212
第四节 隋朝外交的特点	217
第十章 唐朝的外交(上)	221
第一节 唐朝的兴起	221
第二节 唐代的对外关系	223
第三节 唐代的对外战争	230
第四节 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	241
第五节 唐代西域与丝绸之路	243
第六节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	247
第十一章 唐朝的外交(下)	252
第一节 玄奘、义净与唐朝佛教民间外交的高潮	252
第二节 鉴真东渡	257
第三节 唐代的外国侨民	259
第四节 唐代的外交制度	264

第五节 唐朝外交的特点	269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的外交	279
第一节 五代的更迭与十国的错列	279
第二节 五代十国的对外交往	283
第三节 石敬瑭甘当儿皇帝	285
第四节 五代十国外交的特点	288
第十三章 宋辽金西夏的外交(上)	290
第一节 宋辽金西夏的鼎立	290
第二节 宋朝的对外关系	296
第三节 辽金西夏的对外关系	300
第四节 宋辽澶渊之盟	302
第五节 富弼出使辽国	304
第六节 沈括出使辽国	307
第十四章 宋辽金西夏的外交(下)	310
第一节 宋金海上之盟与靖康之变	310
第二节 南宋的建立和宋金的和战	315
第三节 王伦四次出使金国	318
第四节 郝经出使宋朝	321
第五节 宋代的经济外交	326
第六节 宋朝的外交制度	330
第七节 宋朝外交的特点	336
第十五章 元朝的外交	340
第一节 元朝的崛起	340
第二节 蒙古的西征	342
第三节 元朝的对外关系	345
第四节 元代使臣的频繁出洋	352
第五节 元朝的经济外交	355
第六节 元朝的外交制度	358
第七节 元朝外交的特点	361
第十六章 明朝的外交	365
第一节 大明的开国	365

第二节	明代空前的朝贡关系	366
第三节	陈诚五次出使西域	371
第四节	郑和七下西洋	377
第五节	万历援朝抗倭战争	383
第六节	明朝的外交制度	386
第七节	明代外交的特点	391
第十七章	清代前期的外交	395
第一节	清朝的建立	395
第二节	清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397
第三节	索额图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405
第四节	图理琛与《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408
第五节	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荷关系	411
第六节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	414
第七节	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的较量	417
第八节	朝贡外交的困境和式微	419
第九节	清代前期的外交制度	422
第十节	清朝前期外交的特点	428
结语	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规律	433
主要参考书目		443
后 记		451

前言：中国千年外交演变的基本轨迹

中国外交自产生到现在已几千年，先后经历了古代外交、近代外交、现代外交和当代外交等不同时代。中国古代外交是指自中国外交产生以来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的外交。《中国古代外交史》叙述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历史。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产生和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时期，汉朝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定型时期，唐朝是中国古代外交的鼎盛时期，清朝是中国古代外交的转型时期。梳理中国古代外交史，厘清千年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轨迹，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时代外交的本质特征、基本区别、历史作用和重大启示。本书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但为使读者对中国从古至今的外交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仍在前言中对中国古代外交、近代外交、现代外交的基本轨迹和区别做一概括，更为全面的了解反而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理解。

中国古代外交：夷务外交时代

中国古代外交叫夷务，所以，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书名仍叫《筹办夷务始末》。中国外交起源于现在中国大地上汉族政权与其他政权之间的交往，也包括汉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交往。

夷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夷夏观，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华夏以外的地区皆为夷狄。夷夏观主要是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观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中国为天下中心、

人类文明的渊藪，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式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如十年动乱期间响彻中国大地的“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宣传口号。夷夏观同天下观互为表里，夷务外交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哪一类天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夷务外交追求的是以中国为宗主，以四夷为附庸的华夷一统，不承认主权平等，因此，汉代的国宾馆名为“蛮夷邸”，无论什么夷人来访，见到中国皇帝都要下跪，夷务外交最基本的礼节是跪拜，所以夷务外交时代可称为跪拜外交时代。

夷务外交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政权和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外交，是中原王朝和草原王朝之间的外交，夷务外交在国防功能上体现为塞防外交。奉行夷夏之防外交政策的历代中原王朝，以农业为立国之基，而被目为夷狄的匈奴、突厥、吐蕃、鲜卑等政权则以游牧为支柱产业。塞防是中原王朝的国防战略和外交战略，如何抵挡来自草原王朝金戈铁马的挑战，始终是中原王朝深感头痛的问题，很多时候，中原王朝和草原王朝就在现在中国境内的大地上来往与对峙，例如宋朝和辽朝、金朝、西夏，就是现在中国境内当时的汉民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农耕民族政权和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来往与对峙。

夷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范围不断变迁的时代。学习中国古代外交史，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区分“中”与“外”的问题。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时期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藩臣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也有一些并不是藩属而是通过友好交往与中国发生关系，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不分主次，一概称之为“朝贡国”。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按时代的不同情况，予以具体的评价。夷务外交时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与民族关系是变动的，一些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推移，后来变成了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例如，汉匈冲突时，汉匈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呼韩邪单于降汉以后，汉匈关系逐渐成为中华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

夷务外交体制是千年相沿的所谓朝贡体制，这是蕴含着强烈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和反映。朝贡的前提是，其他国家接受

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君王交替或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呈放射状，以“朝贡一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朱元璋一坐上龙椅，便急忙通过朝贡制度，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自己“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他“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以天朝上国之君的身份，要求诸国“尊事中国”，他的口气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口气都大。例如，他公开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1]更有甚者，他钦定《太清歌》，歌词曰：“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2]朝贡体制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使皇威远播；二是四夷外国通过朝贡表达对中国皇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三是获得强大中国的承认是东方不少国家君主合法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

相对于后来的洋务外交时代和国务外交时代，夷务时代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最高，相当于当今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著名外交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夷务外交时代早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硕果累累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推崇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提出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认同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崇尚的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春秋战国时代还是中国外交家大显身手的时代，“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

[1]《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2]《明史》卷六三，《乐三》第1568页。

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桩‘金氏纪录’也”。秦汉以后,夷务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arbitrational power)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1]。

夷务外交留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国力越强盛,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地妥协,从而越能有所作为。例如,强大的汉唐时代,是和亲外交最活跃的时代,昭君出塞、文成入藏,一代代天子把公主们一个个外嫁到“番邦”,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甚至向突厥称臣12年!当时也并没有几人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2]。

中国近代外交：洋务外交时代

鸦片战争导致了洋务外交的产生。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洋务外交的开展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洋务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洋务外交和夷务外交一字之差,却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外交开始走向终结。洋务外交时代与夷务外交时代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中国不给外国以平等待遇,现在是列强不给中国以平等待遇,洋人成了清廷的太上皇,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许多是在这个时期被迫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外交史上最丧权辱国的时代之一。

洋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变局观。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塞外的草原帝国,而是来自海上的工业帝国,中英、中法、中日等矛盾相继成为中国对外主要矛盾,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按李鸿章的说法,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引文均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一章第三节,岳麓书社1999年版。

[2]《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247页。

于是，变局观取代夷夏观，海防外交取代塞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救国之策，洋务运动由此产生，这是对待“千古变局”清醒和理性的回应。夷务外交只承认中国先进，洋务外交则不同，其核心是承认外国先进，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师夷之长技”必然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必然要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必然要促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洋务外交的出现，事实上导致了我国近代以来科技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产生，大大拓展了传统外交的眼界。

洋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短暂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既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国耻，外交上也实现了重大转型：

一是负责外事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班列各部之首，结束了以往没有“外交部”的现象。自秦汉以来外交主管部门地位低下，中央政府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有主管外交的部门。按照唐德刚的说法，“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1901年，朝廷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中国外交进一步向现代外交接轨。

二是中外首次互设使馆，互派使节。最早到中国的外国使节是英国公使卜鲁斯，他于咸丰十年（1860）抵达北京，此后法、俄、德、比、意、奥等国也陆续向中国派出公使。清廷也派出了使节，“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1]。郭嵩焘先于陈兰彬两年，于1876年9月赴任，所以是中国第一位实际驻外的公使。

三是以西礼逐步取代跪拜礼，流行千年的跪拜礼逐渐退出外交舞台。洋务外交最基本的礼节是鞠躬，因此，洋务外交时代可称为鞠躬外交时代。

四是由歧视侨胞转为保护侨胞。清初规定，凡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均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回国后，一经拿获就地正法。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消息传到国内，乾隆却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2]1876年，清廷接受郭嵩焘的建议，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这是中国开设的第一个领事馆。清廷强硬处置华工在秘鲁受迫害案，与秘鲁专门签约，并派高级外交官前往调查落实情况

[1]《清史稿第二百一十二卷·表五十二·交聘年表上》。

[2]转引自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